

# 访与思

## ——中国人成熟吗

邱震海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 访与思

——中国人成熟吗

邱震海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访与思 / 邱震海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4

ISBN 978 -7 -5060 -6238 -1

I . ①访… II . ①邱… III .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9475 号

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

( FANG YU SI—ZHONGGUOREN CHENGSHU MA)

作    者：邱震海

责任编辑：姬利 付云阳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版    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000 册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15

字    数：228 千字

书    号：ISBN 978 -7 -5060 -6238 -1

定    价：38.00 元

发行电话：(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5210012

## 前言 我为什么提出“中国人成熟吗”这个问题

很久以来，我就一直想提出这个问题，但却迟迟没有动笔。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将会得罪很多人，而且几乎会引起公愤的问题。这个问题后面的潜台词很明显，那就是：中国人不成熟，或至少不那么成熟。

当然，这里所说的成熟，不是生理上的成熟，而是精神上的成熟；而当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一个集体概念，来谈论其是否成熟的时候，那谈的无疑是中国人集体精神世界的成熟程度问题。既然这样，如果没有细致的观察、客观的分析、严密的逻辑，这个命题很可能会引起全民族的公愤和声讨。

要反对这一命题的理由太多了，随便举几个出来吧：

其一，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勤劳勇敢的传统；说中国人不成熟，那就等同于对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侮辱。

其二，中国人是一个集体概念，而这个集体概念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的；个体的特征，即便具有群体意义，也不能上升为“中国人不成熟”这样一个笼统、武断的结论。

其三，若要讨论“中国人成熟吗”，那首先要讨论“成熟的标准是什么”。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切忌以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问题，更切忌以“教师爷”的方式对中国问题指手画脚，不然不但于事无补，而且还会在中国大地上不受欢迎，甚至遭到“痛打”。

其四，即便中国人的民族集体性格中有一些缺点（我们的前辈柏杨就有过“丑陋的中国人”的著述，同辈的龙应台也曾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但若以偏概全，或无限拔高，将这些集体性格中的缺点上升为“中国人不成熟”的命题来加以概括，还是会伤害我们这个民族的绝大多数善良的人们。

这样的反对理由还可以举出很多。这都是导致我这些年虽不断思考，但却始终没有动笔成书的原因。

但另一方面，导致我产生冲动来提出这一命题的理由也很多：

其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百年现代化之路走得非常崎岖，撇开道路本身的曲折，值得注意的是：其间的许多弯路本可以避免，而完全是由我们的主观认知程度不到位。百年的血雨腥风、国共斗争，其实都是为了救国；但救国为什么一定要让空气中充满血腥，而且为什么杀的都是自己的同胞兄弟？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其二，中国百年现代化，曲折中前进，坎坷中奋进，可歌可泣，惊天地泣鬼神。好不容易到了中国崛起，扬眉吐气，但回头一看，百年前提出的许多精神领域里的目标，几乎一个都没有实现。历史走了百年，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而且离当年精神领域的目标更加遥远了。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其三，最近三十年，我们的改革开放发展很快，中国一跃而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改革到了一定阶段就无法继续推进，阻力重重；面对阻力，我们的许多精英再次展开左右方向之争，抓住的是表面的情绪，绕过的是问题的核心，一如我们的前辈也是绕过了问题的核心，经常为同一个目标、不同的切入方式而打得你死我活。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其四，中国发展之快有目共睹，但心灵的虚无和迷茫也令人十分吃惊。当财富日益丰厚的时候，在这片土地上，因为有毒食品盛行，人们居然开始为“吃什么安全”而发愁；小女孩倒地，大白天被两辆货车碾过，18个路人居然视而不

见。赚钱昧着良心，做人没了底线。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其五，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物质贫困，心灵开放，90年代开始却正好相反，物质富裕，心灵封闭。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中国人的物质更加富裕了，但心灵是更开放还是更封闭了？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但随着物质的日渐富裕，中国人日益迷茫却是不争的事实。所谓迷茫，就是觉得未来不可知。于是，就有了那么多的富人移民。富裕了，反而迷茫了；发达了，反而移民了。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其六，过去的百年，我们一直仰视西方；但一夜暴富之后，我们开始俯视西方。过去的谦卑和自卑，今天的自信与自负，是那么迅速而自然地在我们的身上交替呈现。只是，当我们的经济总量已超过大多数西方国家，因而一不小心由自信走向自负乃至傲慢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国内转型仅处于西方国家百年前的水平，而我们却并不自知，甚至依然自大。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其七，我们的民族正在崛起，但因积弱贫穷的历史而依然残留悲情，这种悲情之上的崛起，使得我们的行为时而悲愤、时而亢奋。这个时候，我们尤其对军事感兴趣，对“强国之梦”感到亢奋，而对思想却异常漠然。这就犹如一个满腔悲愤的十几岁少年，手持一挺机关枪。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其八，我们的民族饱经风霜，有时像一个五千岁的老人，因负荷太重而显得保守、迟钝；但在崛起期有时又像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肌肉日长而又似懂非懂。今天的中国，到底是老人的迟钝还是少年的鲁莽？一些问题上该有的锐利，中国似乎没有；而另一些问题上不该有的咄咄逼人，中国则似乎又占尽先机。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其九，历史上凡是崛起而又稳健的民族，必然经过一个重要的阶段，那就是思想启蒙，亦即通过大规模的公共讨论，对全民的集体精神展开一场洗涤。经过一番启蒙，大多数人的心灵深处将呈现很大不同，保守将变得开明，激进将变得理性，鲁莽将变得稳健，进取而不具威胁，雄心勃勃而不再咄咄逼人。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思想启蒙，但恰恰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崛起了。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其十，我们这个民族有过辉煌的成就，但也犯过很严重的错误。但我们从来就只是歌颂成就，不反思错误，尤其不反思民族集体犯过的错误，比如46年前那

场席卷我们民族大地的亘古浩劫——“文化大革命”。人人都知道，不清醒反思历史，就不可能有稳健的未来。今天的中国就处于这样的状态。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十一、即便有所谓的反思或讨论，我们更多习惯于“大批判”式的风格：无论什么事，我们都习惯于将责任推给某一个个人或集团，大家群起攻之，口诛笔伐，于是个体的责任解脱了，世界照旧，中国的艰难循环依然。殊不知，中国的问题虽多，但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我们每个个体的素质。只是我们经常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十二、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健康的公共讨论。然而，今天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多元，公共空间已经出现，但公共讨论却没有形成。充斥今天公共舆论的是网络谩骂和围观，甚至就连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教授也因骂而一举成名、博得掌声，甚至还获得“自由与包容”的保护。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我不能，也不愿再往下写了，不然就一不小心慢慢地写成一本书了。上面的这些问题，有些涉及的是中国问题的表层，有些则触及到中国问题的深层和精神本质。

多少年来，我们似乎一直在谈中国的问题和它的解决方案。多年来我们谈问题，大都是在谈问题的表层，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由于没有触及到本质，所以我们只能在表层上打转，在情绪上争执。

同时，由于情绪占了上风，所以当我们谈解决问题的方案时，首先占据上风的也是情绪。为了情绪，我们可以互相指责、互相排斥，甚至互相杀戮，岂不知这些方案都是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只不过切入点有所不同而已。

等到有一天所有的指责、排斥和杀戮都完成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问题是，这个认识经常来得太晚了，我们已经为这些指责、排斥和杀戮付出了太多的时间和太高的代价。

更可恶和可笑的是，我们往往不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刚刚为一场闹剧付完高昂的学费，我们又开始为下一场闹剧支付更高昂的学费。拆了建，建了拆，这些我们很熟悉的逻辑循环，又岂止于一般的市政或基建项目建设？

多少年来，我们经常在做这样一些十分可笑的事情。更可笑的是，这些可笑

的事情，我们往往做得十分投入，似乎人人都在从事一件伟大而正义的事业。这就更具有喜剧或悲剧色彩了。

一切的一切，最后都不得不归结到这些“喜剧”或“悲剧”的演员或导演身上。这些演员或导演，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人集合起来，就有了中华民族这个整体。因此，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必定有一些集体的文化基因、民族性格和精神世界里的共同特征。

正是这些共同特征，导致我们不时出演一些“戏剧”，最后演着演着就演成了“悲剧”或“喜剧”，浪费了我们民族的时间和资源；更重要的是，这些“悲剧”或“喜剧”使我们民族经常走一条不确定和不稳健的道路上。

这就不得不让人提出“中国：需要更成熟”这个可能会招致公愤的问题。

不错，数千年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十几亿中国人民勤劳善良。但这一切似乎都与成熟与否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

岁月会催人白头，也会催人老成，甚至催人世故，但催人成熟却不是必然。如果以为世故就是成熟，那无异于将庸俗当成了幽默；如果以为沧桑会必然导致成熟，那无异于是说：只要将牢底坐穿，走出来的个个都是圣人。

所谓的成熟是有一些标准的，走向成熟也是需要一些前提的。

成熟的标准千千万万，但有一条最重要的标准，那就是理性。所谓理性，无非是两个特征，一是摆脱情绪，二是直达核心。

有了理性，另外一些能力也将慢慢随之而来，比如思维的穿透能力，比如批判审视的能力，比如多元辩论（而非吵架或谩骂）的能力；有了理性，另外一些意愿也将慢慢生长起来，比如妥协、协商的意愿，比如遵守规则的意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实，国民教育和儿童教育是一样的。一个儿童，若学会了上面的那些元素，即便暂时成绩差一点，会的乐器少一点，都无伤大雅，他（她）最后基本上是个可塑之才；反之，即便是少年天才，也依然让人感到未来的不确定、不稳健和不可靠。

走向成熟的前提也有很多，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两条：一是悟性，二是学习。悟性是先天的，学习则是后天的。注意，这里说的学习，不是学习专业知识，而是理性能力的学习与培养。有人埋头学习，悟性不足，最后还是一事无成；有人悟性很强，但缺少的是如同“临门一脚”的理性精神的学习和培养。中国和中国人，大抵属于后者。

中国人的聪明和悟性毋庸讳言，不然我们不可能在短短三十几年里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也不可能历经磨难而依然不倒。但我们缺少的往往就是这最后的“临门一脚”，亦即理性精神的学习和培养。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临门一脚”的缺失，它往往使我们在很多的重要关头无法深入，功亏一篑。清末新政，我们功亏一篑，不然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将会改写；辛亥革命，我们功亏一篑，不然二十世纪的血雨腥风将可避免；如今，中国的改革又到了十字路口，各派争执不休，我们是否又要功亏一篑，让后人再写一本《2012年的中国在干什么》。

理性精神的缺失，导致了中国人集体精神世界的某种不成熟。这种缺失，就像足球场上那个“可恶”的守门员，将中国人的聪颖放进了球门，而将成熟永远挡在了门外。因此，世界看到的中国人，是一群非常聪明，但某种程度上又不甚成熟的中国人。

聪颖和不成熟，就这样浑然合一地“缝合”在我们民族集体精神世界的深处，不但让世界困惑，同时也让我们自己时常感到迷茫，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看不清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到底什么才能让我们真正满足和快乐。

读到这里，你也许已经开始沉思，也许你比之前更加愤怒，恨不得拿刀杀了我。既然这样，我还是赶紧收笔，让大家一章一章地往下读吧……

# 目录

contents

前言 我为什么提出“中国人成熟吗”这个问题	001
<b>第一章 中国战略反思</b>	<b>001</b>
一、当下中国的战略困境	002
二、中国战略问题的思考	014
<b>第二章 中国人的凝聚力呢？</b>	<b>023</b>
一、快速发展之下的人心	023
三、拯救心灵的良方在哪里	030
<b>第三章 十字路口的徘徊</b>	<b>037</b>
一、内部转型的困惑	038
二、民众内心的关注	046
<b>第四章 今日中国之我见</b>	<b>057</b>
一、中国发展的研判	059
二、方向在哪里？	073

<b>第五章 五四之未完——中国需要理性精神</b>	<b>087</b>
一、革命与改良的另类解读	090
二、门槛上的理性洗礼	093
<b>第六章 中国人的精神成熟</b>	<b>103</b>
一、中国人的精神是不是成熟?	104
二、精神世界的成熟之路	114
<b>第七章 现代化中的自我迷失</b>	<b>131</b>
一、中国百年现代进程一瞥	132
二、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与陷阱	137
三、“大国之梦”走向何方?	153
四、强国之梦和百年悲情	163
<b>第八章 坐看西方成败</b>	<b>181</b>
一、我们和西方世界的纠结	182
二、西方人自己的茫然	201
<b>第九章 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b>	<b>209</b>
一、未完的思想启蒙	209
二、冷静自省的清醒之士	222

## 第一章 中国战略反思

2011年10月2日，香港国际机场，一个已经有些凉意的秋天下午。

我终于决定放下手中正在进行和筹备的不少节目，接受日本外务省的邀请，赴日本考察、调研一个星期，焦点是地区战略格局。

也许是这几年工作越来越繁忙的缘故，一个星期的外出调研，对我而言几乎成为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呼吸着香港机场略显浑浊的空气，我忽然想起美国前著名主持人拉里·金的一个抱怨：自从接手了《拉里·金直播》王牌节目后，他25年来没有度过一次超过一周的假期；即便是在度假期间，他每天也都要阅读至少十份报纸。

今天的电视人，没有人不想有拉里·金那样的成就，但至少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达到他那样的成就和高度。既然这样，我们大概都没有资格抱怨工作的繁忙。更何况，调研作为电视评论人充电的一种方式，本身就是十分需要的。

导致我决定外出充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2012年元月开始，除了原有的《震海听风录》外，我还将主持新开播的《寰宇大战略》，其焦点正是地区乃至全

球的战略格局。这几年，在工作上我去欧洲、美国和东南亚比较多，对于近在咫尺而又异常敏感的日本，反倒有些忽略了。

屈指一算，距离上一次前往日本进行较长时间的战略问题考察，已经七年半了。与七年半前相比，覆盖中日关系的地区战略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记得2004年5月，虽然中日关系由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陷于低谷，但当时我与日本防卫省（当时还叫防卫厅）的研究人员研讨时，大家的共识是：中日之间没有战争议题。但七年半后的今天，我们似乎都不敢下这个判断了。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然而，坐在香港国际机场的休息室里，不知怎么，我想起的既不是中日关系本身，也不是地区战略格局，而是临行前一位日本外交官对我说的一句话：“日本这个国家缺乏战略。今天日本所有的战略都是围绕着美国转，也许近几年还有中国因素。”无论这句话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些许情绪，但这句话似乎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日本的现实或困境。

其实，环顾今天全球的许多国家，缺乏战略的又岂止日本一家？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都缺乏战略，或曰缺乏治国的大方略。许多国家只有小战略，没有大战略；或者说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

坦率地讲，这些国家中，也包括正在崛起的中国。

## 一、当下中国的战略困境

当然，从思想史的角度说，谈论国家战略的时候，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尤其是我们谈论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战略。人类历史上，曾经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在缺乏启蒙和集体精神世界成熟的基础时，一个奢谈战略的国家，往往会走上歧途，19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初的日本都曾有过这样的惨痛教训。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没有战略，有点类似今天的欧洲没有战略。至少对今天的欧洲来说，没有19世纪那样的“战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今天的欧洲人不再以超级大国为追求目标，而是甘愿以二流的国力和军力，换来这块土地上永恒的和平、自由、民主和均富。

这样的境界，东亚的人们也许要到一百年以后才能真正达到。那时，也许历史会印证 2012 年我的这个预言。

### 今天的中国有战略吗？

我们谈论的战略不是一个国家处于上升期的骚动和盲动，而是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发展真正应该具有的方向，以及这个国家一旦遇到危机时的处理方式。它不但包括国防、经济、金融、能源战略、粮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战略，而且也包括长期的发展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有战略一定比没有战略要好，因为这样的国家无论在应对中短期的危机和挑战时，还是在面对长期的发展方向时，始终是清醒、自如、沉着和稳健的。

然而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距离这一步却十分遥远。每一个从事新闻工作的人，甚至每一个稍微关心时政和国家命运的人，似乎都有这样的感觉。

今天的中国，首先面临的不是长期的发展战略，而是中短期如何应对危机和挑战的问题。这几年，充斥在中国民间的一股情绪是对中国缺乏战略的严重不满。在这方面，今天的中国可谓充满困境，用“内外交困”来形容可能是言重了，但问题的严重性却丝毫不能忽略。

### 中国的新兴问题——海洋争端

2011 年 5 月 26 日，在南海主权纠纷史上，恐怕是会被以后的历史学家不断提起的一天：这一天，中国海监船与越南有关方面的船只发生了冲突。据外电报道，在冲突过程中，南海海底的电缆被中方人员剪断……

三天后，越南外交部女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神情严肃地表示：“越南海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越南利益。这是南海冲突发生后，越南方面第一次将军事解决方案公开提到了全球媒体的面前。南海，刹那间让人闻到了战争的硝烟。全球的媒体都将注意力转到了越南的对立面——中国身上。

事件发生四天后，我出发前往新加坡，参加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第十届“东亚安全峰会”（俗称“香格里拉对话”），并与同事一起参与对这次会议

的报道和评论。这已是我第五次采访此项会议，也是第三次作为“香格里拉对话”的正式代表，出席这一亚太地区迄今最为重要的安全与战略二轨对话会议。

从 2007 年开始，我们就是“香格里拉对话”的常客；而且我们每一年都要在这里与美国、中国和周边地区国家的高级军事领导人有一些非正式的约会、谈话或专访。虽然如此，但这一次前往新加坡时，我们的心头还是稍稍有些异样和紧张，原因就是中越在南海问题上刚刚爆发的冲突，以及越方首次将这一问题提到军事解决的高度。

谁都知道，这两个曾被誉为“同志加兄弟”的国家，在友好氛围的水面下，其实涌动着一股渐渐充满敌意的暗流。这股暗流，加上两个国家三十多年前爆发的那场大规模边境武装冲突，让人对中越在南海问题上的军事冲突可能性尤其敏感。

这里更为深层的背景是：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主权纠纷由来已久。2002 年，中国与东南亚有关国家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明确提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但近十年来的现实却是：与中国的克制相比，一些东南亚国家却是“搁置主权有余，共同开发全无”。近年来，无论是菲律宾、马来西亚，还是越南等国，都以各种方式（如领导人登岛、与美国联合军演和先下手为强开发资源等）宣示其对有争议地区的主权或实际掌控权。

任何具有国际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国际政治上素有“实际管辖权优先”的原则，中文的通俗说法就是“既成事实”。而目前的既成事实就是：在具有主权争议的南海岛屿中，越南实际占有 29 个，菲律宾实际占有 8 个，马来西亚 5 个，文莱 2 个，而中国大陆实际占有的却只有 8 个；即便加上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另一个成员——台湾所实际占有的太平岛，中华民族实际占有的岛屿，也只有 9 个。

而在这当中，越南尤其扮演了一个不甚光彩的角色。众多资料显示，历史上越南是贫油国，因此在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越南把南海油气资源的攫取看做实现经济腾飞的关键因素，正是此种资源的战略饥渴导致越南将南沙主权争端放在国家战略最优先的序列之上。

问题更为复杂的一面在于：如果说 20 世纪 60 到 70 年代的美越交恶纯粹出于意识形态原因，那么在新的地区战略格局下，具体来说就是“中国崛起，美国重

返东南亚”的格局下，美越这一对昔日宿敌，则似乎找到了某种共同的战略需求。越来越多的内幕材料显示，美越军事合作正在向着超越双边军事交流、以某种双方共同假想敌为针对对象的方向发展……

2011年6月初的“第十届香格里拉对话”就是在这样的大小背景下举行的。

6月3日下午，中国国务委员、国防部长梁光烈与越南国防部长冯光清在“香格里拉对话”开幕前举行了双边会晤。我作为媒体代表，旁听了中越国防部长会晤的开头部分。这一天，距越南外交部女发言人做出关于动用军事手段的强硬表态，仅仅过了五天；这是越南外交部强硬表态之后中越国防部长的首次会晤。

有趣的是，与越南外交部女发言人的强硬相比，两位身着戎装的国防部长在会晤时，则似乎在官方辞令的背后，小心翼翼地寻找着某种历史共同记忆和意识形态的共性。“好同志、好兄弟、好邻居”的说法，从两位有权向各自的千军万马发号施令，并立时点燃一场熊熊大火的最高军人的嘴里说出，似乎既是外交辞令，又不是单纯的外交辞令……

然而，几乎就在中越两国国防部长会晤的同时，越南军事代表团却向“香格里拉对话”现场的媒体发出通知：两天后，越南国防部副部长将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记者会。显然，这是越南军事代表团在这一地区最高层级安全与战略会议上的一个重大动作，意在向全球媒体通报5月26日中越南海冲突事件后越南军方的立场。而此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军事代表团，则对这一信息完全不了解。

第二天的晚宴上，某国的一名高级军事领导人坐在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旁边，特意向冯光清探询这一从媒体渠道获知的消息。想不到，对此时已被媒体传得沸沸扬扬的这一消息，冯光青竟矢口否认。事后，该国的这位高级军事领导人愤愤不平地对我说：“这算什么事？都已经向新闻界公开的事情，还要向我们保密！”

那么，越南国防部副部长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究竟要向全球媒体传达什么信息？6月5日上午，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和越南国防部长冯光清先后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演讲。与梁光烈措辞温和、旨在向世界各国解释中国和平发展意图的演讲相比，冯光青的演讲一开头就表示：“最近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一些事情，应该引起各位的密切关注。”

而就在冯光青发表演讲的同时，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阮志泳在另一个会议室举行记者会，他开门见山地表示：“5月26日发生在南中国海的事情，是一起暴力事件，越南军方正予以密切关注。”

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阐述完越南军方的基本立场后，笔者在现场第一个提问：“请问，如果未来在南海继续发生类似的冲突，越南军方将有什么下一步举措？”对此，阮志泳表示：“越南军方将密切关注每一次冲突事件的背景。若冲突仅具有民意背景，那么就将提交民事部门处理。”显然，他这里没有说出来的后半句话是：一旦发现具有军事部门背景的冲突，那么越南军方可能考虑采用军事手段。

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的现场，让人再一次闻到了战争的火药味。虽然在随后的半年多时间里，由于中越双方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双方高层领导（包括军方领导）的互访，两国间围绕南海问题的争端有所下降，但战争的火药味，则早已充斥着中越两国的民间和媒体。

2010年下半年以后，我曾受邀到中国大陆多个地方演讲。无论演讲主题是否涉及南海，南海风云始终是各个场合绕不开的一个重要而敏感的话题。许多朋友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问题就是：“南海，到底打还是不打？”

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剧作里有一句名言：“是，还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这句话套用到今天中国面临的南海风云上，竟然也被相当程度地浓缩为“打还是不打”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

如前所述，2002年签订的《南海行为宣言》十年来几成了一纸空文，中国的忍让成为令一些国家有恃无恐的契机；而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首都河内的一句“我们回来了”，让多少东南亚的战略家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还是让我们回到2011年6月的“第十届香格里拉对话”现场。会议第一天，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盖茨在主题演讲中谈到美国因国内经济问题可能削减军事开支，但却仍将坚持在亚洲地区的存在时，会议现场出现了阵阵骚动。

曾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的新加坡李光耀学院院长马凯硕直接向盖茨发问：“亚太地区面临的重大挑战是中国崛起，包括军事力量的崛起。请问美国在军事开支日益缩减的情况下，怎么向我们——你们在东南亚的盟友保证，美国将依然能